

一本美国原国防部长反核武器历程之书

My Childhood
My Career - Perry



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

山顶是无核世界，山脚是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我们不时地受到核武器扩散的威胁。在这样的世界中，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一枚核炸弹被引爆，造成难以想象的毁灭。在对抗核威胁中，我们携起手来努力向山顶攀登……

【美】威廉·J·佩里 (William J. Perry) 著 忠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MY JOURNEY AT
THE NUCLEAR
BRINK

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

「差」威廉·J·佩里 (William J. Perry)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 / (美) 威廉·J·佩里著;
忠华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11
书名原文: My Journey at the Nuclear Brink
ISBN 978-7-5086-6841-3

I. ①我… II. ①威… ②忠… III. ①核武器问题—
研究—世界 IV. ①D8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1639 号

My Journey at the Nuclear Brink by William J. Perr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2015 by William J. Perr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

著 者: [美] 威廉·J·佩里
译 者: 忠 华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插 页: 16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6-773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841-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我亲爱的共同生活 68 年的妻子
莉奥妮拉·格林·佩里 (Leonilla Green Perry)
及我们的孩子、孙辈和曾孙；
他们给我一切理由中最佳的理由，
使我继续工作以确保核武器不再被使用

从威廉·佩里的整个生活和工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高智商、绝对正直、有罕见的视野、有不寻常的成就及人道主义信念毫不动摇的人。这些品质生动地体现在这本回忆录所叙述的令人激动的故事中。比尔^①在其卓越的生涯中为减少核威胁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比尔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介入核安全问题，那时他是美国驻日本占领军的一名军人，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巨大毁灭性后果。结束了在日本的服役后，他成为美国政府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参与了冷战期间侦察核威胁技术的研发。在卡特政府时期，比尔是国防部主管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他致力于研发我们的军队至今还在使用的隐形技术和其他使作战能力大幅增加的高科技系统^②，以抵消苏联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常规力量（他的“抵消战略”）。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期间及任期届满后的“二轨外交”^③活动中，比尔发展了成功的谈判方式，他把精确而

① 威廉·佩里（William J. Perry）的名字威廉（William）的昵称是比尔（Bill）。——译者注

② 这些高科技系统还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地形匹配技术等。——译者注

③ “二轨外交”（Track 2 Diplomacy）是指冲突各方的私人精英或智囊团体之间非政府、非官方、非正式的接触和谈判。相应地，政府、官方、正式的接触和谈判被称为“一轨外交”（Track 1 Diplomacy）。“二轨外交”有助于通过私下探索，提供解决政治、经济、军事冲突的可能途径，从而促进官方的“一轨外交”，但是“二轨外交”不能取代“一轨外交”。现在，某些外交事务分析家还提出“一轨半外交”（Track 1.5 Diplomacy），即官方和非官方人士的频繁互动，合作解决利益冲突等问题。——译者注

中肯的分析、平衡各方安全利益的考虑及晓人以理的有效说服能力三者相结合。比尔在后冷战时代利用这些外交技巧与从前的敌方建立了军事合作，“和平伙伴关系计划”^①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成功地促成了“纳恩—卢格计划”的实施，撤除苏联存放在它解体后出现的新独立国家的核武器。比尔还提出了在核武器原料方面的国际军控计划和安全措施，这是迈向核安全极其重要的一步。

我很高兴与比尔共事，并在他的鼓舞下共同为更好地控制核武器和核裂变材料而努力。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同西特·德雷尔（Sid Drell）^②、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萨姆·纳恩（Sam Nunn）^③一起召开了许多研讨会，并撰写了许多论述我们观点的文章^④。菲尔·陶勃曼（Phil Taubman）^⑤在他2012年的书《伙伴关系：五名冷战勇士和他们的禁核弹努力》（*The Partnership: Five Cold Warrior and Their Quest to Ban the Bomb*）中描述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强调在通往核安全的过程中必须采取

①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在国际上简称“PFP”，它是佩里于1994年刚任国防部长时与北约（NATO）磋商后由北约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提出的。内容涵盖军事政策、经济、科技、教育、环境等一切方面，供参加这个伙伴关系计划的国家各自独立选择合作项目。——译者注

② 西特·德雷尔的西特是西德尼（Sidney）的昵称。他是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副主任，曾积极支持和培训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设直线加速器。他是斯坦福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创始人之一，也是1960年成立的“杰森国防顾问团”（JASON Defense Advisory Group）成员，JASON由英语7—11月的第一个字母组成，表示该顾问团在这几个月里聚会活动。他在1998年退休后仍积极从事控制核武器的活动，2011年获奥巴马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章。——译者注

③ 萨姆·纳恩的萨姆是萨缪埃尔（Samuel）的昵称。他在1972—1996年连任24年参议员，在民主党为参议院多数党时，他必定是参议院军委会主席。1991年提出改革国防法案。——译者注

④ 舒尔茨、德雷尔、基辛格和纳恩在2014年9月撰写了一本书：《核安全：问题和前途》（*Nuclear Security: The Problems and the Road Ahead*）。——译者注

⑤ 菲尔·陶勃曼的菲尔是菲利普（Phillip）的昵称。他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站主任，2005年，他以揭露老布什政府未经法院授权非法窃听所有美国居民的电讯往来而出名。——译者注

的一些重要步骤。萨姆·纳恩形象地用一座高山描述我们的想法：山顶是无核世界，山脚是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而且往往疏于保管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裂变材料。在这样的世界中，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一枚核炸弹被引爆，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我们力图使自己投入精力向山顶攀登，迄今已取得一些进展。

冷战的终结导致大量核武器被裁减，所以今天的核武器储存数量不到1986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①会见时的1/3。但是，现在不确定性又回升了，我们又一次受到核武器扩散的威胁。在对抗核威胁方面，我们的合作及比尔个人的努力一直持续着，我们特别注重教育青年们懂得核武器的危险和防止其被使用的途径。比尔除了在斯坦福大学为学生开设核安全课程外，还为全球广大青年主持网上的连线教育。

本书所生动叙述的比尔的历程还在继续，他积极地从事遏制核武器回潮的工作，并引导世界再次走上建设性的道路。在比尔追求禁核的征程中，他的夫人莉（Lee）^②总是在他身旁。常言道，每一位伟大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位伟大的女人，比尔与莉之间的爱情和紧密的伙伴关系就是一个证明。莉坚定地支持着比尔的禁核历程，同时完成了她自己的重要目标。她因努力改善美国军人家庭的生活质量而获得军队授予的奖章；她还被阿尔巴尼亚总统授予“教母特蕾莎奖章”^③，以表彰她为改善阿尔巴尼亚军人医院的质量标准所做出的贡献。

①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首都，1986年10月11—12日在此举行了美苏首脑会谈，戈尔巴乔夫提出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库、中程核导弹和禁止核试验，以换取美国10年之内不在太空研发“星球大战”计划。里根表示美国绝对不能停止“星球大战”计划，会谈失败。——译者注

② 莉（Lee）是莉奥妮拉（Leonilla）的昵称。——译者注

③ 特蕾莎修女（1910—1997）是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裔天主教徒。她主要在印度为贫困人民做天主教慈善工作，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乔治·舒尔茨 (George P. Shultz)^①。加州山景城 (Mountain View) 圣安东尼环形路 11 号 B 的照相馆, 约瑟夫·伽拉珀洛 (Joseph Garappolo) 和克里斯琴·皮斯 (Christian Pease) 拍摄

比尔在其生涯的每一阶段展示了他对美国军人家庭成员福利的关注。他作为被征召的一名士兵而开始服役, 所以他对每个士兵及每个士兵的家属的关怀完全出自其本人的内心。他理解战斗力与生活质量之间有着钢铁般牢固的逻辑关系, 并且全心全意地赞成陆军总军士长^②理查德·基德 (Sergeant

① 舒尔茨在任里根总统的国务卿 (1982—1989) 期间, 与中国达成了“八一七公报”, 逐步减少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武器出售; 与苏联达成了双方从欧洲撤出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他认为封锁古巴是愚蠢的, 应开放与古巴的关系。他的观点当时不被认同, 现在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他的主张。他在尼克松总统时期 (1969—1974) 曾任劳工部长、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以及财政部长, 主持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退出金本位。2008 年 1 月, 他与佩里、基辛格、纳恩联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走向无核世界》(Toward a Nuclear Free World)。舒尔茨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他出生于 1920 年, 现已 96 岁, 但仍活跃于政治和经济学界。——译者注

② 总军士长是美国各军种特有的职位, 相当于少将级, 他们在五角大楼有自己的办公室, 将军们见到他们时都要敬礼。——译者注

Major Richard Kidd) 的名言：“关心你的军队，他们将会关心你。”任何在军队服役过的人，例如我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都知道必须把军队放在第一位。

比尔深刻改善军人家属生活质量的承诺反映在他看到军人营房，尤其是军属住所急需改善后所采取的行动中。在比尔开始处理军营问题时，他很幸运地拥有额外的一双眼睛和一对耳朵，他视察军营的同时，他的妻子莉与军人家属攀谈。他们的工作是一种坦率和新颖的“政府一个人伙伴关系”，其结果是国会于1996年授权大力改善和不断保持军营的质量。

比尔的这些突破性创举被克林顿总统铭记在心，总统在1997年比尔任期届满的告别仪式上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并致辞说：“比尔·佩里可以被记载为美国曾有过的最能干和最有效率的国防部长。”

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① 将军评价佩里是“非凡的公务员”，他说：

是的，佩里是极有天赋的人；是的，他是有巨大能量和感染力的人；是的，他极其关怀那些为他们的家庭而穿着我们国家军装的人们。但是，他首先和最主要的是意志坚定的人，他是做正确的事而不顾其付出的代价的人。

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比尔·佩里，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他还在以高专业水平和能力及永不冷却的热情继续追求的历程。

乔治·P·舒尔茨

^① 沙利卡什维利（1936—2011）出生于波兰的一个格鲁吉亚家庭，身份是无国籍难民，1952年移民至美国，通过看电影学会说英语，在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和国际事务硕士。1958年加入美国籍后被征召入伍，1968—1969年参加越南战争。1993—1997任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是美国军队历史上唯一的外国移民担任此职位。离职时，获得“总统自由勋章”。——译者注

当代最严峻的安全威胁是一颗核弹在某个城市里有随时爆炸的危险。这是我的核噩梦，它来自我长期和深刻的经验。这个危险可能以下列情形发生：

一个秘密的小团体在一个秘密场所内操作普通的商用离心机设施，提纯足够制造一枚核弹的30公斤浓缩铀。

这个团体把这些浓缩铀运到附近的秘密地点。那里的一支专业技术队伍用这些浓缩铀在两个月内组装成一枚简陋的核弹，并将其安放在贴着农用设备标签的一个箱子里，运到附近的机场。

一架机身标有民用航空公司的运输机把这个箱子运到一个国际机场的货物转运枢纽，在那里把箱子转放到另一架飞往华盛顿 D. C.^①的货运飞机上。

^① 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称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通常简称为华盛顿 D. C. 或 D. C.，因为美国以华盛顿命名的还有西北部的1个州（华盛顿州）、31个县、20多个市和240多个镇。在行文中已明确是指首都华盛顿 D. C. 后，才可以简称华盛顿。——译者注

这架货运飞机降落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这只箱子被送到华盛顿东南区的一个库房里。

这枚核弹被从箱子里取出装载到送货的卡车上。

一名自杀者把这辆车开到国会大厦（众议院正在那里开会）与白宫之间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在上午11点钟引爆核弹。

核弹的当量是1.5万吨TNT炸药。白宫、国会大厦及两者之间的一切建筑都被摧毁。8万人立即死亡，其中包括在爆炸现场的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和320名众议员。10万以上的人受重伤，没有医疗设施救护他们。华盛顿的通信设施，包括移动电话的中继站，全部失效。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播放华盛顿被炸毁的视频，并报道说，它收到一个信息声称，还有5枚核弹藏在美国的5个城市，在今后5个星期内每星期引爆一枚，除非美国驻扎在海外的军队立即全部撤回。股票市场行情在10分钟内狂跌，一切交易停止。国家陷入恐慌，人们如潮水般涌出主要城市。整个美国的生产活动停滞。

国家还面临着宪法危机。总统的职务临时由参议院的议长代理，核弹爆炸时他正在梅奥（Mayo）医学中心^①治疗胰腺癌，不能回到处于军事管制的华盛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已被炸死，当时他们正在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他们提交预算的听证会……

我们很难接受——然而我们必须想象——这个假设性情境的灾难性后果。这只是用来阐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恐怖组织从朝鲜或巴基斯坦买到或偷到一枚核弹，或者从储存着高浓缩铀或钚却没有足够防卫措施

^① 梅奥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志愿参加北军的一位英国医生，1863年他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创建梅奥医学中心。现在，它被国际医疗界评为世界最佳医院的第二位。这里治疗过里根总统的阿尔茨海默症、福特总统安装心脏起搏器、老布什总统夫妇的4个股骨头置换。——译者注

的国家之一偷到核反应堆中的裂变物质，其结果就与上例相似。

在某个城市引爆一枚核弹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然而，虽然这个灾难会导致比“9·11”事件严重数百倍的伤亡，公众对此却只有模糊的意识。其结果是，我们现有的措施不足以应付即使是小规模核攻击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本书旨在把我们面临的严峻危险告诉公众，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以大大降低这种危险。我讲述的是，我把自己生活中必不可少和超越一切的目标转变为确保核武器永不再被使用。

我的特殊经历使我敏锐地认识到核危险，并思考几乎不可想象的核战争后果。我对于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各种可能选择有第一手经验，特别是接触过绝密的内情，而这些使我具有独特的、冷静思考的优势，进而可以得出结论：核武器不再给我们提供安全，而是给安全提供危险。我认为，作为知情者，必须把自己了解的这些危险告诉公众，并且必须让公众知道我对该问题的想法，即该做些什么才能使未来几代人摆脱逐年增长的核危险。

在整个冷战和大量构建核武库的年代里，世界曾面临由于误算或偶发事故造成核灾难的前景。我认为这些危险从来不只是理论上的。我曾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做过分析员的工作，并且此后在国防部担任过3个高级职位，这个经历使我每日与这些令人恐怖的可能性有密切接触。

虽然这些核危险随着冷战结束而消退，它们现在却以一种令人警觉的新伪装回来了。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由于俄罗斯在常规力量方面远远不如美国和北约国家，因此它的安全依赖于核力量。俄罗斯感觉自己受到北约扩展至它的边境及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威胁，其言论日益具有敌意。它的敌意论调是

以大规模改进其核力量——新一代的导弹、轰炸机、潜艇及这些运载系统上的新型核弹头——作为支持的。最不祥之兆是它抛弃了“不首先使用”政策，并声称准备用核武器对付它感受到的威胁，无论是核威胁还是常规威胁。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俄罗斯可能由于严重的误算而认为它的安全取决于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以对付紧急情况。

除了这个日益增长的危险外，我们还面临着冷战时代未曾有过的两个新危险：地区性核战争，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战争，以及核恐怖袭击，如我在本文开端描述的那样。

我在1996年（即我任国防部长的最后一年）的一段经历使我认识到核恐怖威胁是实际存在的。一辆卡车上的炸弹在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大厦（Khobar Tower）军营附近被引爆，19名空军人员被炸死，假如恐怖分子能把他的卡车开到离军营更近的地方，数百名空军人员可能被炸死（就像1983年在黎巴嫩发生的炸死220名海军陆战队员那样）。美国不知道是谁组织了这次袭击，但是我们知道其目的是迫使我们从那个国家撤军，就像黎巴嫩的那次袭击后美国撤军那样。

我认为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使命是重要的，如果在这种形式的压力下撤军将是严重的错误。所以，在沙特国王法赫德的合作和支持下，我们把美国空军基地搬迁到远处，确保我们军队的安全并继续执行我们的使命。我发布了声明，宣布这个搬迁，我们将严密地防卫我们的新基地，恐怖集团将不能阻止我们完成在沙特的使命。

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人在互联网上刊载了对我的新闻发布会的反应，他号召发动对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的圣战，并附有针对我个人的古怪而有威胁性的诗篇：

啊，威廉，明天你将被告知，

年轻人将面对你狂妄自大的对手，
一个小伙子微笑着投入战斗，
并且带着沾染血迹的长矛回来。¹

5年后，在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更多地知道了本·拉登，我也明白了他发信息给我的全部含意。随着分析家们加强对本·拉登的恐怖集团“基地组织”的研究，他们认识到，这个组织的使命不仅是杀害数千名美国人（如它在“9·11”事件中做的事），而是要杀害数百万人，而且它要努力得到一枚核武器。如果基地组织得到核武器，我毫不怀疑他们将用于对付美国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预防措施，我前面戏剧性描述的核噩梦可能成为悲剧性的现实。这些预防措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没有公众介入就不能付诸实践。本书解释了这些危险，并阐述了能大大减少这些危险的措施。

我的内心依然充满希望，我们能扭转危险日益增长的趋势，并提供我的最佳建议：该怎样去扭转。公众只有深刻了解危险是怎样的现实和紧迫，才会愿意按这些建议去做。

威廉·J·佩里

MY JOURNEY
AT THE
NUCLEAR BRINK

致 谢

我在本书中阐述的事件构成一个“选择性的回忆录”，记录了我在核时代的成长，我在它的形成和被遏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面对今日这些核武器呈现的威胁，我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在几十年的长期历程中，我的妻子莉给予我莫大的支持，而且还有许多优秀的人士同我一起工作，他们和我都承诺要使世界更安全。我感谢他们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帮助我实现出版本书愿望的人们。

为了有助于出版本书并利用本书编写教学材料，我在美国核威胁倡议组织（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NTI）^① 之下成立了“威廉·J·佩里计划”。NTI的最高领导层——萨姆·纳恩、琼·罗尔芬（Joan Rohlfing）和黛宝拉·罗森勃鲁姆（Deborah Rosenblum）——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观点并提供鼓励、财务管理及他们懂行和能干的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下列人士巨大的私人支持，我的“计划”不可能问世，这些人士包括：道格拉

^① NTI 是由特纳（Turner，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者兼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和参议员纳恩于 2001 年成立的一个无党派、非营利的组织。它的主旨是研究和提倡在国际新形势下如何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其范围也包括生物和化学武器。——译者注

斯·格里逊 (Douglas C. Grisson)、伊丽莎白·霍尔姆斯 (Elizabeth Holmes)、大林和乔伊丝·徐 (Ta-lin and Joyce Hsu)、弗莱德·伊斯曼 (Fred Iseman)、皮契和凯茜·约翰逊 (Pitch and Cathie Johnson)、约瑟夫·坎普夫 (Joseph Kampf)、郑和辛娣·金 (Jeong and Cindi Kim)、马歇尔·梅多夫 (Marshall Medoff)、马克·佩里 (Mark Perry) 和梅拉妮·裴娜 (Melanie Pena)。我很感谢他们的慷慨支持。

这个计划的另一个主要合作伙伴是斯坦福大学：它的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CISAC) 和弗里曼·斯鲍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SI)。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办公场所，与杰出的安全问题专家的日常联系，并创造了学术研究和共同为目标奋斗的氛围。我要特别感谢提诺·奎拉 (Tino Cuellar)、迈克尔·麦克福尔 (Michael McFall)、艾米·齐加特 (Amy Zegart)、戴维·雷尔曼 (David Relman) 和琳·伊登 (Lynn Eden)。

斯坦福大学还帮助实现该计划的教育目的，它支持开设以本书为基础的试验性新课程，使我们能建立联网的教学材料。参与教学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和学者有：玛莎·克雷绍 (Martha Creshaw)、詹姆斯·古拜 (James Goodby)、西格·海克 (Zig Hecker)、戴维·霍洛韦 (David Holloway)、拉维·培特尔 (Ravi Petel)、斯科特·塞根 (Scott Sagan)、乔治·舒尔茨和菲尔·陶勃曼。此外还有斯坦福大学请来的客座教授：阿什·卡特 (Ash Carter)^①、乔·西林克隆 (Joe Cirincione)、安德烈·库科申 (Andre Kokoshin) 和乔·马茨 (Joe Martz)。

我根据记忆撰写本书。尽管已过去了40、50年，甚至是60年之久，

^① 阿什·卡特是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最后两年的国防部长。——译者注

一些事件依然生动地存留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是刚发生的那样。但是，我知道最好还是不要单靠我的记忆。因此，我十分感谢那些为本书而投入时间、专业知识、记忆力，核对事实，进行编辑和文字修饰的人们。

以下我称之为朋友的人都在我的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他们都同意为本书中的关键事件接受采访、提供观点和共同回忆细节。他们是：阿什·卡特、西特·德雷尔、柳·富兰克林（Lew Franklin）^①、约舒华·戈特鲍姆（Joshua Gotbaum）、保罗·卡明斯基（Paul Kaminski）、保罗·克恩（Paul Kern）、迈克尔·利比茨（Michael Lippitz）、萨姆·纳恩、乔治·舒尔茨、拉里·史密斯（Larry K. Smith）、杰弗里·斯塔（Jeffrey Starr）和已故的阿尔伯特·威龙（Albert Wheelon）^②。我很庆幸自己可以与这些有判断力和献身精神的人们合作。

我还要感谢五角大楼的安全评估办公室主任马克·朗格曼（Mark Langerman），他指导和帮助我的手稿迅速通过安全检查评估。

4位杰出的青年军官，中尉罗伯特·凯叶（Robert Kaye），海军少尉泰勒·纽曼（Taylor Newman）、约舒华·戴维·华格纳（Joshua David Wagner）和托马斯·道特（Thomas Dowd），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学位的同时贡献了大量时间核对事实和文献摘引。根据这几位斯坦福大学顶级研究生所做的精细工作可以判断，我们的军队掌握在优秀者手中。

在这个计划的早期，我们召集了一个本科生顾问委员会，研究关于核武器的危险信息，并提出如何使他们这一代人介入这些问题的建议。他们是：

① 富兰克林是ESL公司（电磁系统实验公司）最有创意的工程师之一，后来兼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译者注

② 威龙（1929—2013）是中情局第一任科技情报处长，4年后离任到休斯飞机公司主管研制第一代间谍卫星和通信卫星；那时美国的通信卫星几乎都由休斯公司制造。——译者注